

公共的微言大義

——評任劍濤《公共的政治哲學》

● 文明超



任劍濤：《公共的政治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一 困惑

到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七十年。人們通常以1978年為界，把共和國的歷史分為前後兩段。因此，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

七十年的歷史分為「前三十年」（1949年到文革）與「後四十年」（改革開放後）兩部分。在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特別是在最近兩年中國公共政治正在發生微妙變化的時期，如何回顧當代中國公共政治發展七十年的曲折歷程，總結與反思「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遭遇的挫折與困境，從而為將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勾畫願景與期待，是大多數中國政治學人在這段時間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與氛圍下來閱讀任劍濤先生的著作《公共的政治哲學》（引用只註頁碼），可謂恰逢其時。這是因為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會不由自主地把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七十年歷史，以及最近兩年中國公共政治發生的微妙變化和各種現象，與作者對西方公共政治哲學的理論分析以及某些公共政治現象的學理闡釋進行對照與聯想，從而加深對兩者的理解。特別是，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一些頗有原創意味的概念與分析框架，例如「私人領域公共化」與「公共領域私人化」，

任劍濤的《公共的政治哲學》提出了一些頗有原創意味的概念與分析框架，例如「私人領域公共化」與「公共領域私人化」，似乎是為中國問題量身訂造，對人們理解「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中國公共政治的本質特徵與困境，非常有啟發意義。

本書對西方公共政治哲學理論、公共政治的實踐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剖析。然而，一旦我們帶着中國問題意識深入其中，就會發現本書更像是為當代中國公共政治實踐提供政治哲學反思而作。

似乎是為中國問題量身訂造，對人們理解「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中國公共政治的本質特徵與困境，非常有啟發意義。

在經過這樣一番對照閱讀之後，敏銳的讀者也許會隱約意識到，這本著作其實並不是一本單純的西方理論研究作品。誠然，本書分為八章，從八個議題入手，對西方公共政治哲學理論、公共政治的實踐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剖析，被譽為「漢語學界首次對公共進行深入系統研究的政治哲學著作」（封底）。然而，一旦我們帶着中國問題意識深入其中，就會發現本書更像是為當代中國公共政治實踐提供政治哲學反思而作。

許多讀者或許會認為，上述論斷存在着過度解讀的嫌疑，因為任何人只要認真讀完本書都不難發現，本書提及「中國」的地方屈指可數。只有在極少數地方，例如在論及傳統政治及革命問題的時候，「中國」二字才很不情願地被作者「擠出」頁面之上。因此，那些熟悉任劍濤的著述及學術旨趣的讀者，在耐心讀完這本充滿嚴謹的概念辨析與理論辯難的著作後，可能會產生這樣一種困惑，甚至是遺憾：一位富有中國政治現實關懷的政治學者，耗費數年光陰完成的這本五百多頁的著作中，竟然沒有任何對當代中國公共政治現實的專門論述。原因何在？

這樣的閱讀困惑其實早在作者的預料之中。作者在〈後記〉中特別提到，本書以西方政治哲學作為主要論題，「會讓人們質疑筆者的中國關懷問題」。但作者很快指出：「就直接表達自己的中國關懷而言，

本書研究主題無疑限定了筆者對之的直觀呈現。但這並不等於說本書讓中國關懷全然隱退。事實上，本書的中國關懷之深沉和全面，幾乎可以說滲透到字裏行間。」為此，作者提出幾個方面的辯護：第一，這本書雖然以西方理論為主題，「但卻是中國體驗而非西方體驗的產物」，因此本書的分析「是一種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的西方理論解釋」。第二，本書的選題是建立在漢語學界關於「公共」的認知基礎上，並且它所對話的對象是漢語學界的學者，「參與漢語學術界的相關學術爭論」。第三，儘管本書着眼於西方公共政治理論與實踐的分析，「但這種描述分析，並不打算為西方國家開列改善其公共狀態的對策」，反而針對的是中國的現代公共政治實踐。因而作者宣稱：「本書完全受到中國關懷的引導。」（頁564-65）

這段言辭懇切的文字表明，前面提到的種種閱讀困惑完全是誤解。作者鄭重提醒我們要注意書中字裏行間滲透出的中國關懷，同時也暗示本書雖然以西方公共理論作為研究主題，但對西方理論的研究是為了解釋中國問題。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作者為何沒有在書中詳盡羅列、介紹西方最新的公共政治哲學著作。在整本書的分析與論述過程中，作者也無意追逐或附和最新潮、受人追捧的觀點。例如，當西方學者普遍哀歎公共精神衰落而呼籲公民美德的時候，作者卻着重強調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作用；當不少中國學者受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與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影響而緬懷古典公共政治的時

候，作者卻宣稱「回歸古典」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取捨之間，與其說體現了作者的理論偏好，不如說顯示了作者對中國獨特的政治現實及其改革需求的判斷。

如果說，「在每一本政治理論著作背後都有一個『首惡元兇』(summum malum)，也就是作者在政治生活中最恐懼或最蔑視的那種東西」^①，那麼促使任劍濤寫作本書的「首惡元兇」無疑就是他的中國問題關懷，只不過它被作者以微言大義的方式隱藏在對西方理論的論述之中。究竟這個被隱藏起來的中國問題是甚麼？作者是如何分析這個問題的？其意義何在？尤其是它對我們理解與面對近兩年中國政治的微妙變化有何啟示？這些問題對於了解這本重要著作的內容及其學術意義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本文嘗試通過解讀與分析本書的「微言大義」來回答這些問題。

二 微言

隱微寫作並不是古人的專利。在任何時代，只要言論自由得不到切實保障、公共問題不能公開討論、公民意見不允許充分表達，人們就不得不以微言大義的方式把他們的真實觀點隱藏在字裏行間。因此，當中國某些學者把施特勞斯關於古代哲人隱微寫作技藝的闡釋及其實踐，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哲學創見在國內進行推廣的時候^②，為現代主流政治理論辯護的學者與知識份子早已默默實踐了數十年。這些學者與知識份子利用他們因深厚學識而擁有的「信息不對稱」優勢，

把他們無法公開表達的觀點隱藏在艱深晦澀的文本中，以此迴避政治風險。就此而言，本書堪稱典範。

大體上，本書的隱微寫作方式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考察。首先是話語技術層次上對敏感問題的學術化陳述。作者通過抽象的概念、普遍化的敘述方式，把他對普遍國家的現實問題用學術語言陳述出來，以此迴避影射特定國家或特定政治勢力問題的指責。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作者在描述某種政治現象時，常常使用一些生僻而晦澀的語句。在某些地方，作者甚至寧可採用「私人(有)化集團」這樣拗口的術語，也不願使用「政黨」或「黨派」這個政治學概念(頁131-38)；政黨的英文“party”具有「部分」、「黨派」之意，其實非常符合「私人(有)化集團」所要表達的意思。作者這樣選擇無疑是想迴避影射現實而帶來的政治風險。就此而言，作者的中國關懷確實「滲透到字裏行間」，但在話語技術的微觀層次上，我們只能得到零散的信息，無法窺探整本著作所要探討的中國問題。

其次是議題層次上的「隱微對話」。從話語分析方法來看，所謂「隱微對話」，其實就是一種不明確的互文性手法，即「一個文本可能在另一個文本未被明確暗示出來的情況下，『結合』另一個文本：例如，人們可以通過用語詞表達他自己的文本的方式來回應另一個文本」^③。在本書中則體現為：作者在各個議題的分析與闡述過程中對西方各種理論的批評或支持，表達其理論立場及對中國政治現實的判斷，並以此「不點名地」回應國內某些學者的觀點。那些熟悉當代中

本書的隱微寫作方式首先見於話語技術層次上對敏感問題的學術化陳述。在某些地方，作者寧可採用「私人(有)化集團」這樣拗口的術語，也不願意使用「政黨」或「黨派」這個政治學概念，無疑是想迴避影射現實而帶來的政治風險。

國知識份子之間的爭論的讀者或許會意識到，作者關於「公共」與「公共性」的區分，針對的是汪暉等學者對「公共性」概念的理解與使用^④；對古典公共與現代公共的討論，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劉小楓、甘陽等學者對施特勞斯學派古典政治哲學的推崇^⑤。

這些「隱微對話」參與的爭論無疑是重要的，但我們不能把它們視為本書的中國政治關懷所在。本書並不是一本爭論性著作，而是一本在中國政治經驗基礎上進行系統性理論建構的著作。這些爭論只不過是理論建構的副產品，而不是它的主旨。這也意味着，作者關心的是一個比這些爭論更宏大的中國問題，這些爭論只是這個宏大問題的具體議題之爭。因此，本文不打算在這個層次討論這些爭論。一旦我們弄清楚這個更宏大的中國問題，再回過頭來審視作者與這些學者的爭議，會發現作者其實設置了一個溫良而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對話框架。這個框架對於當前國內各派學者擺脫「各說各話」、「互不妥協」的「政治神學」態度，重構中國公共政治未來的討論，具有重要意義。然而，要弄清楚這一點，需要我們繼續往上追問，把握該書主題層次的「微言大義」。

這樣，我們最終從「議題」層次進入全書「主題」層次，來探討其中隱藏着的中國問題，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點。在此，我們需要面對兩個難題：第一，貫穿全書的主要問題是甚麼？第二，作者如何在當代中國公共政治的歷史與現實反思中發現這個主題？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頗不容易，涉及對本書的細緻

文本解讀。由於篇幅所限，在此筆者只能做一個概要性的解釋。

首先，本書雖然有八個議題，但如果我們仔細研讀，當會發現這八個議題其實有一條主線或一個主要問題貫穿其中，那就是：在一個現代社會中，該如何實現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平衡，從而避免「私人領域公共化」（簡稱「公共化」）和「公共領域私人化」（簡稱「私密化」）的危險？作者指出，「所謂公共化，就是將私人的完全融入到公共領域，使私人的一切在公共權力、公眾視野的光照之下，從而使公共的公開性與私人的隱匿性界限完全被取消」。在這種狀態下，公共權力完全控制私人生活，公共價值、理念完全壓制個人偏好。而「所謂私密化，就是將公共權力與公眾視野完全遮蔽在私人生活之中」。在「私密化」的狀態下，「一切關乎公共的理念、制度與具體事務都沒有人關注，人們要麼陷入內心的心理體驗而自閉，要麼進入一種吃喝玩樂的日常自然生活的張狂狀態而忘情，要麼掉進躲避崇高而自我欣賞其低俗和流氓的陷阱而自娛」（頁125-26）。

現代社會具有一個公私領域互相區分但又互相滲透的複雜結構。在這種複雜結構中，公私領域要維持平衡非常困難，因此如何迴避「公共化」與「私密化」這兩種危險成為西方公共理論以及公共政治實踐的根本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的反思基礎上，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公共政治哲學，以及公共政治制度和實踐方式。從本書的結構上看，第一至三章探討了相關西方公共理論的觀點，以及它們之間的分歧。

本書的八個議題其實有一條主線或一個主要問題貫穿其中：在一個現代社會中，該如何實現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平衡，從而避免「私人領域公共化」和「公共領域私人化」的危險？

大體而言，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者更關注「公共化」帶來的危險，而共和主義者以及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等左翼知識份子更關注「私密化」導致的社會問題。因此，前者更注重如何限制公共權力對個人領域的侵犯，而後者則更強調通過公共空間的建構及公民美德的提倡，促進公民參與。在對諸種理論分析與批判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一個良好的現代公共政治體系需要實現「公私之間的平衡」，並指出不同理論派別能夠為此提供哪些理論貢獻。

在此後五章，作者在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公民的觀念與行動這兩個方面，分五個議題探討了如何建構並維持一個良好的現代公共政治體系。這五個議題的討論基本上都體現了作者如何迴避兩種危險、實現公私平衡的問題意識。在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方面的論述中，這種問題意識表現得尤其明顯。在社會結構的建構上，作者強調公共領域、私人領域與第三領域的互相重疊與平衡；在政治制度設計上，強調公權與私權的相互制約（「私權的公共維護與公權的私人限制」）；在國家與公民關係上，強調兩者對公共的相互限定（頁 258-59、476）。所有這些對相互制約的強調，都是為了在結構上保持公私領域的平衡。

秩序良好的公共政治不僅需要制度支持，也需要公民具有某種精神品質。因此，作者強調公民要有公共理性以及公共精神。公共理性是一種探究公共事務、形成共識與「公意」的程序。只有通過公共理性，才能避免公共輿論中的私人意見遮蔽「公意」，同時也可以避免抽

象的集體化「公意」壓制個人意見（頁 319-22）。在公共行動上，作者強調公民既要有激情，又要有理性；既要有公共參與的美德，但也要尊重不參與的權利（頁 502-503、516-19）。偏向前者會帶來「公共化」的危險，偏重於後者則會導致「私密化」的困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如何迴避這兩種危險正是貫穿全書的主要問題。

作者對這個問題的關注與思考無疑是以中國政治經驗為基礎的。對「公共化」問題的關注，很大程度上來自作者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反思。本書出版後，任劍濤在一次講座中就明確以他在文革中的經歷作為例子，闡明「公共化」的含義，並指出「文革就是中國最典型的徹底公共化」^⑥。關於「私密化」問題的研究，任劍濤早在 2004 年就已經有相關的論文〈私密化與公共關懷——以當代中國為例的討論〉^⑦。從題目上就能看到，他對「私密化」問題的研究也是來自對中國政治現實的觀察與反思。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的政治歷史來看，任劍濤的判斷無疑是準確的。從 1949 年到文革，中國社會結構的「公共化」愈來愈明顯。早期的「私有制改造」使經濟領域開始「公共化」，而到了文革期間的「思想改造」，「公共化」達到了頂峰。個人連最具私密性、隱藏在內心的觀念和思想都要以各種思想檢討或自我批判的形式，付諸於公共審查。對於任何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這種「公共化」帶來的痛苦是畢生難忘的。

然而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私人財產及個人生活觀念愈來愈得

文革期間的「思想改造」，使「公共化」達到了頂峰。改革開放之後，「私密化」出現了。執政黨的「公共性」被動地受到削弱；市場經濟改革使人們愈來愈多地關注個人事務，出現公共關懷衰落以及政治冷漠現象。

本書隱藏起來的中國關懷是：當代中國的公共政治建構，如何才能迴避「前三十年」的「公共化」危險，以及「後四十年」的「私密化」困境？如何迴避這兩種危險，既是西方公共理論的主要問題，也是當代中國政治歷史與實踐反思的主要問題。

到尊重，市場經濟改革也促使私人經濟的發展，一個相反的趨勢——「私密化」出現了。首先是改革開放促使社會日益多元化，這在客觀上使得執政黨的「公共性」被動地受到削弱。此後，執政黨採取「三個代表」的意識形態及相關措施來提高其「公共性」。但「權貴資本主義」的批評日益增加，以及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問題愈來愈多，所有這些都表明公共權力的私人化運用仍然阻礙着「公共性」的重建。這也是中國政府近年來進行大規模反腐運動的根本原因。其次是個人生活的「私密化」。市場經濟改革與發展使私人生活變得更豐富多彩，但也促使人們愈來愈多地關注個人事務以及私人情感世界，出現公共關懷衰落以及政治冷漠現象。任劍濤在其他著作中多有描述，在此不再贅述。

至此，我們大體明白本書隱藏起來的中國關懷是甚麼了。在筆者看來，答案就是：當代中國的公共政治建構，如何才能迴避「前三十年」的「公共化」危險，以及「後四十年」的「私密化」困境？如何迴避這兩種危險，既是西方公共理論的主要問題，也是當代中國政治歷史與實踐反思的主要問題。正是這兩者在問題上的契合，使得作者能夠把他對中國問題的關懷隱藏在對西方理論的研究這個主題當中。

三 大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宣示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站在這個「新時代」的門檻上，本書對過去七十年中國公共政治問題的理論化探討有何意義？筆者嘗試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闡述。

首先，作者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為當代中國政治「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的問題提供了政治哲學反思與批判，並在此基礎上為「新時代」的中國政治改革提供兩條反思性的基準線，這是本書最直接、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公共化」和「私密化」可以說深刻把握當代中國政治史「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的本質特徵。前者是公共領域過度擴張並壓制個人自由，使個人利益與私人生活完全得不到保障與尊重，其結果是文革悲劇。後者是國家「公共性」衰落，從而導致公共權力的私人濫用；公民個體陷於私人事務而缺乏公共關懷，以至於中國政治改革喪失了動力。這兩者都是需要避免的「惡」。因此，作者對兩者的批判分析無疑為中國公共政治改革提供了兩個準則：既要避免「公共化」，又要避免「私密化」。在當前左、中、右翼各種理論、各種觀點糾纏不清的喧囂時期，尤其在中共十九大後中國公共政治改革前景仍需釐清的時期，這兩個最基本的準則給公民判斷與思考中國政治現狀及未來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對簡潔而理性的指引。

其次，作者對這個問題的提出及其學術化分析，為中國公共政治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本土資源與反思動力。如前所述，西方學者與知識份子對「公共化」、「私密化」這兩種危險的歷史反思推動了西方公共

理論及實踐的發展。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西方知識份子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德國與蘇聯極權主義的反思，奠定了當代公共理論的基礎。有意思的是，自由主義者通常認為極權主義是「公共化」的體現；而為當代共和主義思想來源的阿倫特卻把它視為「私密化」的惡果^⑧。這種差異激發了公共問題的爭論，成為當前西方公共理論對話與發展的思想源泉。本書通過對當代中國公共政治歷史與現狀的反思，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使國內學者對中國公共政治的討論與思考，擁有了了一個能切身觀察的事實基礎。同時，對當下現實的感受及親歷歷史的切膚之痛，也就成為學者爭論與反思的動力，從而為中國公共政治理論本土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理論本土化對於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來說尤其重要。這是因為最近二十多年來，西方自由主義理論遭遇一系列批評，使得西方自由主義學者陷入一場疲於奔命的反應性自我辯護中。當人們批評自由主義無法包容少數族群，一批學者便提出「多元文化主義」理論，論證自由主義能更好地保護少數族群權利^⑨；當人們批評自由主義忽視公民美德，就有了《自由主義美德》(*Liberal Virtues: Citizenship, Virtue, and Community in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之類的著作^⑩。這樣，西方自由主義學者日益退縮到為西方憲政民主國家進行自我批評與辯護的狹小論域中^⑪。他們忘記了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的民眾抱有對憲政、民主、自由的訴求。更重要的是，這些經過「調適」與「收縮」的

自由主義理論喪失了早期那種激進的批判性力量以及個體解放的使命感，根本無法回應人們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強烈願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探究自由主義的學者顯得孤立無援且地位尷尬。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處境就像當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後的中國共產黨一樣，必須立足本土來建構理論並推進其學術研究與社會批評的使命。

就此而言，「公共化」與「私密化」問題的提出與理論化，可以說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一方面，它抓住了當代中國「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的公共政治問題的要害；另一方面，它又與當代西方公共理論的主題相契合。無論是對中國問題的研究，還是對自由主義的理論貢獻上，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再者，作者對「公共化」和「私密化」的雙向拒絕，為自由主義與左右兩翼學者的爭論設置了一個溫良而有建設性的對話框架。「公共化」與「私密化」的強烈現實批判性，並不意味着作者對中國政治的反思採取一種「政治神學」的好戰姿態。恰恰相反，這種雙向拒絕塑造了一種不走極端、溫良平和的對話態度。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作者在自由主義理論的許多經典議題上都採取了溫和的立場：既強調市場的作用，又承認在實踐中市場要受到公共權力制約(頁272)；在公民行動上，既強調理性但又承認激情的必要性(頁502)。這種溫和的立場並不是一種簡單的、不假思索的妥協，而是作者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對「公共化」與「私密化」危險進行雙向反思的結果。

「公共化」與「私密化」問題的提出與理論化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它抓住了當代中國「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的公共政治問題的要害；又與當代西方公共理論的主題相契合。

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相互滲透的現代社會裏，公私之間既要保持適當距離，又要相互支持。這樣一種狀態就必然要求一種雙向拒絕的理性思維。為此，自由主義者首先要放下完全站在私人領域一邊來抵擋公共領域的極端立場。

在作者提供的對話框架下，左右兩翼學者對於中國社會「私密化」的擔心與批評得到了作者一定程度上的承認，儘管作者與他們對「私密化」的表現與原因分析有很大差別。我們不難看到作者在許多議題上都承認公民美德、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重要性，然而，他並不會因此弱化對「公共化」危險的警惕。正是這種防範意識，促使作者在對話中指出兩派學者的觀點中可能存在的為了「公共化」而壓制個人自由的危險。換言之，這個對話框架是有底線的，任何導致「公共化」與「私密化」的觀點，作者都會毫不猶豫地拒絕。但在這兩條底線之內，本書給我們展示了探究自由主義的學者一貫的寬容態度。

無疑，這個框架是作者從現代主流政治理論的角度提供的，但它是一個能夠合理期待的、可望被左右兩派學者接受的框架。畢竟，雙方雖然都對當前的「私密化」不滿，但也不願意文革「公共化」悲劇重演。換言之，如何迴避兩種危險是中國左右兩翼知識份子共同面對的問題，使得這個對話框架具有某種「重疊共識」的力量。因此，我們不要為本書首三章擺出的三大理論派別爭論的論戰姿態所迷惑；實際上，本書並不是要吹響戰鬥的號角，而是要伸出和平之手。

四 結論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本書為當代中國「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公共政治問題反思，提供了一個政治哲學理論框架。「前三十年」呈現出來的是「公共化」的危險，最終帶來文革的悲劇；「後四十年」體現的則是「私密化」的傾向，導致國家權力的「公共性」衰落困境，以及民眾公共精神和政治關懷的缺失。對此，作者的態度是明確的：未來中國公共政治建構必須迴避這兩種危險。因此，作者借鑒西方主流公共理論，從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公民觀念與行動兩個層面，闡明現代社會如何才能避免這兩種危險，建構公私平衡的現代公共政治。

對「公共化」與「私密化」的雙向拒絕立場，使作者在許多議題的論述上都顯得理性與平和。在當前中國的各種政治聲調中，保持這樣的理性態度無疑是重要的。不少支持現代主流政治理論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最近兩年中國政治種種現象呈現出來的政治體制改革停滯或倒退的可能性，多有擔憂與失望。這再次印證本書的洞見：一個良好的公共政治體系的建構與變革不應寄託於外在力量（神祇、哲學王或偉大領袖），而只能產生於公民共同體之內（頁385）。因為人類歷史表明，一旦這個外在力量希望把它的權力用來實現某種高貴理想或信仰，可能出現「公共化」的危險；相反，如果這個外在力量不願意分享權力，公共權力可能會出現私人化的結果，成為領袖人物或集團的工

作者對「公共化」和「私密化」的雙向拒絕，為自由主義與左右兩翼學者的爭論設置一個溫良而有建設性的對話框架。這個框架是作者從現代主流政治理論的角度提供的，是一個能夠合理期待的、可望被左右兩派學者接受的框架。

具。換言之，文革「公共化」悲劇如何避免重演，以及當前中國社會「私密化」如何克服困境，最終要依賴於中國公民之間的理性與行動。

總而言之，《公共的政治哲學》不僅是一本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理論的著作，同時也是通過西方理論的研究審視中國問題的著作。一旦我們注意到作者的中國關懷，就會在閱讀中發現本書的微言大義；而一旦我們讀懂其中的微言大義，也就會對中國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與認識。一本討論「公共」問題的著作要以微言大義的方式來寫作，既是一種諷刺也是一種無奈。因此，在〈後記〉結尾處，作者不得不感慨：「想說的話很多，能說的話很少。」（頁566）然而，在筆者看來，最重要的那些話已經說出來了。

註釋

- ① 克勞斯(Sharon Krause)著，林垚譯：《自由主義與榮譽》(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頁1。
- ② 最早在國內對此進行介紹的可能是甘陽。參見甘陽：〈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載施特勞斯(Leo Strauss)著，彭剛譯：《自然權利與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62-64。
- ③ 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著，殷曉蓉譯：《話語與社會變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頁95。
- ④ 任劍濤在接受採訪時表明了這一點。參見〈對話任劍濤教授：追求現代化之前，先理解「公共」概念〉，《新京報》，2016年8月20日，B12版。另參見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
- ⑤ 參見劉小楓：《施特勞斯的路標》(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甘陽：〈政治哲人施特勞斯〉，頁1-82。

⑥ 任劍濤：〈公共生活的歷史演變〉(2016年12月16日)，《東方歷史評論》微博，<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53365062509210>。

⑦ 任劍濤：〈私密化與公共關懷——以當代中國為例的討論〉，載萬俊人主編：《清華哲學年鑒2004》(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頁248-74。

⑧ 這是因為阿倫特的「公共領域」概念是指公民擺脫了生物必然性後的自由行動與相互交往的空間，與生物必然性相關的事物則屬「私人領域」。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法西斯的嚴密官僚制，還是蘇聯的計劃經濟，都訴諸人的生物必然性及其衍生出來的管理技術，其中毫無公民的自由行動與交往空間。因此，極權主義下的「公共領域」非但沒有擴張，反而會縮小，人們只能退縮回私人空間，並形成原子化和相互隔絕的狀態。參見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阿倫特的政治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92-96。

⑨ 金里卡(Will Kymlicka)著，鄧紅風譯：《少數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頁4-10。

⑩ 馬塞多(Stephen Macedo)著，馬萬利譯：《自由主義美德》(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⑪ 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無疑是一個典型。在這本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標誌性著作中，羅爾斯把自己的問題限定於「為一種(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政體制定一種政治的政治正義觀念」。參見羅爾斯：〈平裝本導論〉，載萬俊人譯：《政治自由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頁27。

一個良好的公共政治體系的建構與變革不應寄託於外在力量，而只能產生於公民共同體之內。文革「公共化」悲劇如何避免重演，以及當前中國社會「私密化」如何克服困境，最終要依賴於中國公民之間的理性與行動。